

# 明代江南的水利单位与地方制度： 以常熟为例

王 建 革

内容提要：明代常熟水利社会的单位规模与江南社会基层水利的变化相一致。江南水利在塘长制崩溃之后，基层水利失控，有为的水利官员借着水利工程对乡村社会进行整合以恢复水利体制。常熟的水利行政实际上与赋税制度的单位相一致。耿橘选择了“区”作为水利单位，并在此基础上整合了枝河流域的水利工程，重筑了自然圩以基础的共同体社会和县域水利集权。

关键词：耿橘 单位 自然圩

江南水利自五代以后，就形成了官方与乡村分责的二元体制，官方理干河，民间理枝河并筑圩岸。本文立足于常熟县的个案研究，试图对水利社会单元与基层水网所涉及的区域社会作详细的研究，以期揭示太湖水网体系中生态环境与乡村社会的关系。万历年间，耿橘在常熟兴治水利，编纂有《常熟县水利全书》，此书篇幅较大，各类丛书未将其收录，虽然部分内容为许多农书和水利书引录，全书仍以抄本问世。这部书详细到每一个区，甚至每一个圩，对基层水利单位的研究非常有益。

## 一 官民分责

明代江南的基层水利社会所负责的水利责任不单是筑圩，还有浚河与筑坝、闸等务，守着宋代以来筑圩、浚河、修闸的三合一治理模式。其中筑圩所需要区域组织规模最小，浚河往往需要更大的规模，干河需要一个县或几个县的协调才能完成。一条泾或一条浜，一个都、区，或一个里甲规模的组织即可完成。干河不整，水网紊乱，水灾频仍，支河不整，干河也无法得到治理。江南水利社会存在着一个非常相互依存的国家与乡村的关系。正是这种差异，需要不同规模的官民分野。

明代，黄浦江形成后大圩进一步被分割成小圩，自然生态上的小圩使水利共同体在自组织规模上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既没有力量与官方对抗，同时也难以组织起来配合官方疏河。官方开河时，往往派官员下乡，动员民众与之配合，乡村水利共同体

反而要依赖官方的组织。治水能臣统御时,官方开干河时乡村枝河也会兴工。在常熟,县境内还有一条国家在更高层级上统一治理的大河,这就是白茆。白茆动工,不但全县干枝河俱动,邻县也要牵涉其间,而一般县级塘浦往往连着几个都或区。一般而言,河的级别越大,对基层的动员能力可能越强。愈谏修白茆时,就对乡间的圩田系统进行了一次整治。“各属委官先将高乡淤塞泾漕浜湊,低乡坍没圩岸堤防,逐一查勘。照田多寡,分派丈尺,督令得利之人趋时浚筑。及将前项诸湊百渎江塘河港以次开浚,随宜修举。”<sup>①</sup>愈在高乡统计淤塞的河道,低乡统计坍塌圩岸,合计形成水利任务总量,分配给有关区域。一般情况下是政府出钱,社会出力,按里甲单位下派。“各将围岸取土修筑,水涨则专增其里,水涸则兼筑其外,务令高阔坚固,遇旱则车水以入,涝则庠水以出。”共同体之上的官僚管理常常腐败,里甲体系常有扰民之害。吴巖说:“民间凡遇工程一槩科敛,则未免府县派之里甲,里甲派之细民,骚动乡村,鲜有不怨。”<sup>②</sup>

总之,明代的乡村水利共同体处于弱势的状态,为了保护乡民,许多县官干脆放弃水利管理。林应训治水之前,“水利之官,多不下乡,乃使各区塘长,至县报数,或朔望递结而已。此如虚文,何益实事”。为了恢复水利,他仍然要先恢复以圩甲为基层单位的自然圩共同体,然后将官员差遣下乡“泛然丈量”,制定了标准。“干河支港,工力浩大者,官为处置兴工外,至于田间水道,应该民力自尽。为此酌定式则,出给简明告示,缘圩张挂,仍刻成书册,给散粮里,令民一体遵守施行。”这些标准先是低乡与高乡的开河序列:“分别孰为低乡,当急修圩,孰为高乡,当急开渠”;然后才是岸式标准,“议定开筑之法。如开沟洫,不论旧时疏通与否,其阔即以两旁老岸为主,其深务以一丈二尺为率”<sup>③</sup>。由此可见,健全运行的民间共同体,需要官方给予扶持才行。在这种弱势的乡村共同体的情况下,官方要扶持乡间水利共同体,但是,干河疏浚时,往往不是县府主动的,反倒是乡绅向县里提出申请才行动。县令考虑了税收和其他成本之后,决定是否开河。明末开福山塘开工前,二十四等都里排王忠、魏赞、曹和、张镜、褚应元等先提出申请:

为疏濬极要水道,以利民生,以裨国计事,窃惟县有福山大塘,北接潮潮,南通湖水,其东西则有九浙、屈塘、方浜等枝河二十余条,喉舌塞则食不下咽矣,大塘淤则枝河不通矣。忆昔年间,动兴大工,勤于开濬不至淤浅,近自万历十七年开后,两旁芦草交加,似无河影,水底泥沙,壅塞涸如丘垤。即如今岁,

① [明]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一四《俞谏请留关税濬白茆疏》,正德七年,《四库全书》第57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本,1987年,第428页。

② [明]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一四《吴巖条上水利事宜疏》,正德十三年,《四库全书》第578册,第430页。

③ [明]徐光启著,石声汉校注《农政全书校注》卷一四,林应训《修筑河圩以备旱涝以重农务事文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345—349页。

自夏至秋，旱乾太甚，民皆待命于斯而竟无勺水之停矣。请抚按道府动用通县有力大户为之首倡，官给其工费之五六，民用其力者三四，庶事可济而功可能。<sup>①</sup>

乡绅提出申请的背后，可能有自己的水利利益，但更可能的是乡绅愿意在这种事上表明自己是地方利益的代表。在什么编民单位上形成利益认同，或在什么单位上履行代表职责？这似乎是一个官民分责与区域分野的问题。其实，乡绅并不限于“都”一级提出利益诉求，不同都的乡绅会相互呼应，一般而言，这实际上反映了地方共同体在利益上的联合，这种联合直接对官方的行动产生建议，由于官方的行动集中在一条干河上，他们的议政空间其实也在这一条河的流域内形成。不单体现了官民分责，还体现了官民互动。福山塘南通四十五都，北经十四都，四十五都的乡绅相呼应，提出了申请。“公正吴光复、王用、蒋奉益、钱得懋等”连名上书，对福山塘的淤塞状况讲得更仔细，将灾情描述得更严重：“本塘枝河不下及百余条，四通八达，乃邑中之第一紧要干河也，两旁田地不啻数百万顷，国课民生实所攸关。近年来苦被潮沙淤塞，四方商艘不通，半邑粮储难运，水线处仅容一小舟，乾涸处则人行河底，四面枝河悉成平陆。以此每岁遇旱，旁塘田亩尚可车救，腹内禾苗无不枯槁。”这种危机陈述后，他们谋划了包括经费开支在内的许多细节。“嘉靖、万历间工程一倍，今为三四倍矣。切思万姓值此水旱频仍之后，民力告匮之时，况各枝河并举。当此大工，民不堪任，然各枝河例用民力开运，其大塘非领官帑曷克有终。”经费细节都讲了，肯定有乡绅们的合谋在其中。乡绅与官方合作也按江南水利惯例进行，官方疏干河，民间疏枝河。官方则利用一些荣耀倡导绅民。常熟的公文引领县有志于水利的乡绅和民众，以激励本地绅民。“太仓王相公为缙绅首倡，不论官民，一体用力；嘉定则专用民力，不及缙绅。夫太仓之缙绅，肯先劳于民；而嘉定之百姓，肯先劳于己。信皆贤而可爱者。”<sup>②</sup>

福山塘连着区与区间，需要县级统一治理，三丈浦也是这样。一河之内地势不同，既有利益不均衡，就相互之间的斗争。“三丈浦坐落六、七、八、九、十一及上十四、中十四、下十四等区，则开三丈浦者，惟照此八区之田而余区不相涉也。”按整条河派役时，高乡、低乡有利益的冲突。低乡要治岸，高乡要深浚，工程量相差大，派役也就有了区域纷争。乡绅钱侍御上书建议官方应该分别对待高低乡的利益差异。“治生（作者自称）九都人也，治生一户有九都田，有六、七、八、十四等都田，则皆应派者。若别收各区之田，则与该浦何与？而亦混派乎。譬如低乡自有筑岸之事，与高乡无干，治生田在低乡，而亦派及，则低乡之民可俱派乎？若低乡之民有田有此八区者，则亦当计亩照派。如治生虽远离福山港，而有田在彼都，则仍派开福山港，无辞也。治生一户，以十分为率，田坐八区内者，十之六七，在各区收入者，

① [明] 耿橘：《常熟县水利全书》附录卷上《里排乞濬福山塘呈》，常熟图书馆藏传抄本。

② [明] 耿橘：《常熟县水利全书》附录卷上《与通邑缙绅书》。

十之三四。此责令各总书查报销圩细数,不能隐蔽,若户内有弟男子侄并入者,只照都分尽派。治生名下,治生另通融计算,分派弟男子侄。总之,了治生一户事而后止。”钱提到的“都分”,可能即指在每一都的份额。一条河横穿低地与冈身,低田区和高田区有不同的治河任务,最好的办法是各自为政。钱在三丈浦区域多个都内有田,他要求在三丈浦各区内分出高乡与低乡,认为只有这样才“至公至平,土俗人情,允宜允合”<sup>①</sup>。另一位乡民言,“盖在高乡则疏濬塘河,在低乡则修筑圩岸,不肖(乡民自称)田坐潭塘极低水区,岁以水涝为忧,岁以修筑为望。老父母(县官)此举诚为地方兴水利,小民甚幸,不肖幸甚。若为通邑计,不如高区专任开河以防旱灾,低区专任筑岸以防水患”<sup>②</sup>。乡绅在这方面基本上代表区域利益讲话,水利利益本身,构成了区域水利共同体的一种力量。

## 二 自然圩与里甲制的边界

尽管在责任和利益上存在着一个较大区域的水利共同体,但落实在自然界上,最基本的单位仍是圩田单位。五代自然圩的内聚性依托的对象定格在“五里、七里为一纵浦,又七里或十里而为一横塘”的河网与圩田模式下,极像古代的井田制,可惜是一种高度的国家强制下的合一。圩长是基层社会的行政负责人,水利任务就是持续性地修圩浚河,“故低田之堤防常固,旱田之浦港常通也”<sup>③</sup>。明初的大圩规模很大,圩长有一定的权力,到宣德年间,苏州知府况仲破坏了乡村水利共同体,他认为这种圩长之类的人物已经坐大。宣德五年(1430),他提议革除圩长。“访得所属长洲等七县,先该钦差大理寺卿胡,将各县粮长,每区设立总圩长、圩老六名,通该一千六百七十二名,并小圩长与同粮里提督农务,相兼催办税粮。近年以来,公然接受状词,挟制粮里。而本等差役不当,户内税粮不纳,又行包揽小户粮草……欲将害民缘由具奏除革,缘圩长、圩老不系朝廷设置人数,拟合多关本府,转达钦差刑部右侍郎成定夺,示下施行。”<sup>④</sup>况仲时的大圩,与后期的都、区之规模相当一致。圩长权力坐大,支配了赋税征收系统,正由于这种水利共同体在乡间的影响力,才导致圩长成为官方的眼中钉。常熟属于苏州,其县境内所发生的,当与况仲所说的一样。为了摧毁大圩长的势力,况仲时开始大量地拆除大圩。宣德七年,况仲又言:“切见本府吴江等七县地方,滨临湖海,田地低洼。每圩多则六七千亩,少则三四千亩。四围高

① [明]耿橘:《常熟县水利全书》附录卷上《钱侍御回书》。

② [明]耿橘:《常熟县水利全书》附录卷上《陆郡丞回书》。

③ [宋]范成大撰,陆振岳校点:《吴郡志》卷一九《水利下》,第270页。

④ [明]况仲撰,吴奈夫等校点:《况太守集》卷一二《革除圩长示》,(宣德)五年十月二十日,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1页。

筑圩岸，圩内各分岸塍。遇有旱涝，傍河车戽。递年多被圩内人民于各处泾河菑取淤泥浇雍田亩，以致傍河田地渐积高阜，旱涝不堪车戽。傍河高田数少，略得成熟；中间低洼数多，全没无收，似此民难。如蒙准言，乞敕大臣该部计议，行移本府，差落治农官员踏勘，但有此等大圩田地，分作小圩，各以五百亩为率。圩旁深浚泾河，坚筑夹岸，通接外河，以便车戽。”<sup>①</sup>

到明中叶以后的小圩时代，圩田规模小，与河道的联系也相对松散。“圩田之制，随地形之广狭，水道之远近而为之大小圩。”因地制宜，大小圩没有一定的规制，治水者也提倡分圩以治。“小者塍岸易完，民工易集，时有浸潦，则车戽之功可以朝夕计也。圩之大者，岸塍既广，工力不及，积水经月而实粟者将化而为湮腐矣。度其势而分之，使一劳而永逸，事半而功倍。”<sup>②</sup>与从前大圩相比，这时的单个小圩仍有其共同体的单位意义，一个自然圩的圩甲就是本圩水利的组织者。粮长、塘长、图长之下辖是自然圩，基层水利离不开对这种小圩的自组织与管理。自然圩之负责人有的地方称圩甲，张衍言：

水利之职，督于粮老，粮老督于圩甲，其农隙每区每圩修之，务必坚厚，则自久远。其土取之荒荡，不必取之田中，其夫用之本圩，不必取之他所。自九月半起工，至正月初毕工，庶几不废农事。其修圩之际，凡官塘处所，尽为修筑，腹内地方，全不经心，不知官塘水易戽，腹内田仍湮没，此粮里圩甲之罪也。<sup>③</sup>

总之，真正具有合作意义的共同体特征，以自然圩为最强，圩甲是以自然圩为单位的基层社会组织。其上的组织形式，由于已经没有了五代和况仲那时的大圩，只好从属于赋税征收的里甲制系统。但都、区、图的规模与水利并不是一致的，与水利一致的向上利益整合的分区是自然圩之上的河道流域。都、区内的枝河规模较小，县内枝河规模较大，并且存在着的共同利益的民众利益整合，尽管这种利益在组织上几乎不存在。存在的组织是塘长，塘长却是以赋税系统内为整合单位的。由于这时只剩下自然圩是共同利益的组织，所以，真正的治水名家一般首重圩甲，其次才整合区、都内的塘长。万历年间，林应训提出“设圩甲以齐作止”。

塘长之设，举一区而言之也。一区之中，各有数圩，若不立甲，何以统众而集事也？计当金举殷实之家充之。但一时金报，诸弊俱生。或图展脱，或营冒充，无不至矣。各具不必金报，即以本圩田多者为之。虽其殷实与否不可知，然其田既甲于一圩之中，则其人自足以当一圩之长矣。兴工之日，塘长责令圩甲，躬行倡率，某日起工，某日完工，庶几有所统领，而无泛散不齐之弊。中有业户

① [明] 况仲撰，吴奈夫等校点：《况太守集》卷九《修浚田圩及江湖水利奏》，（宣德）七年六月初二日，第93—94页。

② [明] 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二〇《张铎围田沟洫说》，《四库全书》第578册，第729页。

③ [明] 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二二《张衍水利款议》，《四库全书》第578册，第803页。

不听倡率，听其开名呈治。如圩甲不行正身充当，或至别行代顶，查出枷号示众。是圩之有甲也，专为本圩修浚而立，工完即罢，非如里长有勾摄之苦，亦非如塘长有奔走之烦。虽一时倡率，不无劳费，然利归其田，又非若驱之赴公家之役等也。<sup>①</sup>

由此可见，圩甲是最基层的利益共同体，其上是图里负责水利的负责人——该年，其上的区、都水利负责人是塘长。五代时期的大圩与社会整合规模似乎是最好的，因为那样的整合非常直接。由于众多的河网圩田，水利责任复杂，而赋役与水利的派役的区域可能重合也可能不重合。治水者往往会尽量将两者统一。姚文灏言：“各图圩岸，俱著排年分管，若本图原有十圩，则每甲一圩；若不及十圩，则将大圩分湊之；若十圩以上，则并小圩兼管之。”<sup>②</sup>而在自然圩以上的，与河流等级相一致的单位空间，是没有组织的，有组织的，是里甲制的图、都、区等单位。乡绅一般在都、区等更大的规模基础上进行利益博弈。区、都以下，似乎也存在着由更小的河道形成的利益共同，每一条小枝河都可以形成一个单独的利益共同，范围只限于一个村或一个里（图）。里睦与衡浦就是这样的两条相邻的小河，每一条小河都有其责任范围内的农田。张孝廉言：

论田起夫，开河以济田也。开里睦则里睦之田任之，开衡浦则衡浦之田任之，通开则通两河之田任之，吾何知有归徐哉？举大工兴大众，未有不平。其心平，其政而能令众志输服者，即有强梗，又何避焉？查徐氏之田居里睦者七，衡浦者三；归氏之田居衡浦者七，里睦者三，而工力则两河大不相侔耳。以本河之田为本河法之，至平而情之至顺。<sup>③</sup>

他说的“开里睦则里睦之田任之，开衡浦则衡浦之田任之”，指各河各有其责任人户的共同体社会。通开一次需要两河之田，也就是两个共同体社会共同合作。相邻二河的农户内，更多的人户既在此村有田，也有彼村有田。一个官员可以将两条枝河流域的小地域合起来一起兴工，派役时又按各河的地亩派役，按在各河中所占田数量的比例派役是再合理不过了。只是这种小河流的利益共同体一般情况下并不明显，江南地区河网密集，相互之间交叉开放，利益范围也并不固定。

在区、都一级，可能只有乡绅为一个区域的水利责任发表议论，水利责任长官塘长，完全象个小地方官，成了官方利益延伸的代表。从文字表面上看，似乎完全可以代表共同体的利益，“每区都选有行止者为塘长，以图圩之田多者为图长、圩甲，俱

① [明]徐光启著，石声汉校注：《农政全书》卷一四，林应训《修筑河圩以备旱涝以重农务事文移》，第345—349页。

② [明]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一五《姚文灏申飭水利事宜条约》，弘治七年，《四库全书》第578册，第514页。

③ [明]耿橘《常熟县水利全书》附录卷上《张孝廉回书》。

听塘长调度”<sup>①</sup>。塘长文册上有几项内容：一是“某都保区图塘长某人年貌籍贯”；再是“该管大河几条处，某河自某处起至某处止，共长若干丈尺。水源：上从何来，下从何往。灌溉田若干；桥梁闸若干座，有无通潮，有无茭芦，有无树木。”其次是支河几条，圩岸长短等内容。<sup>②</sup>由于完全从属于官僚体制，塘长制常常腐败。“有等营充之人，或指馈送农官科敛图圩，或假开河筑塘卖索夫役，又有市民冒赧，全不下乡劝率，止令佃仆应官，其诸粮老虽曾督责，慢不协理，仰各奉公守法，勤紧兴修。”<sup>③</sup>另外，由于县下专制链条的松散。塘长层级的治水管理人员也是一些松散的群体，组合单位也会经常发生变化。万历年间聂绍昌言：“每图岁轮，该年一名，率作人夫，协力濬筑。有六、七图为一区者，有十余图为一区者。有该年数名，该年之内经充领区总催即为塘长，专总督率各图人夫轮修本区水利。”塘长越区调动，完全违背地方共同体单位的利益了。“塘长之苦，苦在拨调远区，其开河动经数十里，工费动及数十金。塘长派之该年，该年敛之人户，今岁不已，而复明岁，此河不已而复彼河，有名无实。”官方这种作法实际上利用塘长损害基层水利共同体。塘长本身也常处于崩溃之下，他们只是一个民间大户而已，自身不是官僚环节的一员，却要承担官僚体系中的责任，常因赋役赔累而破产。县府也因此试图通过保护地方利益以维持共同体的水利参与积极性，尽量做到役不出区。“该区人户各各自开其田，边河自筑其田，边岸人人可以效力，且人人乐于用力，亦可使人户就近赴工，止出人力，不输银米。”<sup>④</sup>

只有在动乱时期，一个地域内的河流因闸坝体系可以闭合成对外封闭的共同体，才有完全的共同体形态。元代的潘应武已经看到了这种地区封闭和他们在水利方面自然的合作。“乡村钉塞筑坝，河港皆在田围中间，古来各围田甲头每亩率米二斤，谓之做岸米，七八月间水涸之时，击鼓集众，煮粥接力，各家出力，浚河取泥做岸，岸上种桑柳，多得两济。近回水涝，围岸四五年不修治，状若缀梳，桑柳枯朽。一遇淫雨，全围淹没，深有可虑。宜下州县委官省报，谕河港口两岸田围甲头，候河水减退，不拘时候，随即告众户浚河做岸，备要围围相接，除去钉塞坝断去处，使水脉流通，岸上仍种桑柳，如有故违，罪反田主。”<sup>⑤</sup>坝堰的封闭是全封闭，水栅可启可闭。元明交替之际，水栅被豪强用以占地，侵占荒闭的水荡资源。明人的水栅仍有封闭一

① [明] 张国维 《吴中水利全书》卷一五《朱充水利兴革事宜条约》，嘉靖九年，《四库全书》第578册，第534页。

② [明] 张国维 《吴中水利全书》卷一五《蔡干计处导河夫银呈》，嘉靖四年，《四库全书》第578册，第533页。

③ [明] 张国维 《吴中水利全书》卷一五《朱充水利兴革事宜条约》，嘉靖九年，《四库全书》第578册，第534页。

④ [明] 顾炎武 《天上郡国利病书》苏松，《四部丛刊初编》本。

⑤ [元] 任仁发 《水利集》卷三。

个区域交通网的作用。

陂石筑土为坝，列木通水为栅。于水何利而置之，端为盐盗防，故皆属之巡司建置。之初或出乡村之自卫，或出院司之求备，仓卒应命未必皆险要之地，及县每年差属官点查更陪其数多寡、应否，不知何以复命。且近年海寇内犯，编氓守望，邻邦设险，仓皇不瑕为水谋也。其创建成于四封之内者，尤多乱已，自当釐正，若彼豪强欲擅江湖之利，逋逃欲拒勾摄之人，国有法焉。<sup>①</sup>

豪强势力侵占泄水之地形成单独的权力单位在宋元时很多，因当时的泄水之地相对丰富，随着开发的加强，明代的共同泄水之地已经很少，民间的势力人物只能偷占一点河道而已。林智言：“白茆、福山、许浦、七浦等处，潮泥涌浅，久不疏浚，及被豪右将尤泾口拦作斜堰，向东有新村、下射去处，汊港湮塞，又被直塘人家占出半河。其阳城湖东，河港坝断，以致上流不通。”<sup>②</sup>豪强势力在河网中单独地为自己形成一个水利单位，实际上侵害了一个地区的共同体利益。权豪之家，多是围圩筑坝。“权豪之家，多因湖荡沮洳，筑岸围护。先入萑苇岁篮，河底淤泥衰雍，不再阅岁，皆成沃壤。黠者恐人举告，先自报官，愿升荡科轻额，有司但知辟赋土，而不知渚水之区日隘，潦水一至，不能容蓄，散入民田，卑土之民，无宁岁矣。其傍浦居民，多因两厓积沙涨滩，壅占围田，而导水之浦，壅塞如沟，两旁禾菽如茨，而官不加税，民受其害，于是而江海之潮，绝不上浦，亢区之民，又无稔年。”<sup>③</sup>

总之，小圩之上的共同体水利社会单位是多种多样，既不稳定也不固定。赋税征收系统意在强制，要求一种自上而下的压力，水利体制则要求共同体人员的参与。明政府将二者合一，实际上是毁坏了共同体与基层水利的正常运行。官方也想分开以动员民力，却是出现粮长、塘长、区长、图长责任人混乱的现象。“永乐间凡兴建水利，皆责成粮长而官为节度之。盖粮长任在赋税，其用心必专。近年添设塘长，又设立耆老，复革去塘长而立图长，又有属官、义官之委，纷纷多制，十羊九牧。乞令粮长管其都，圩长管其圩，县之佐贰分宇巡视。”<sup>④</sup>之所以出现如此的纷纷多制之情况，一方面是水网与水网社会的复杂多态。固定的大圩一旦消失，更是权力的利益与共同体利益的冲突，况仲毁大圩共同体，更多是为了加强集权专制的利益。以后，尽管有为的治水官员要整合水利系统，由于水利动员的专制模式，这种体制容易被官僚体制整合为害民扰民单位，经常出现官方跨区乱调工的现象。塘长制不稳定。崩溃后的重整往往又要从自然圩开始。林应训的整顿就是一种崩溃后的重整。他先定小圩的标

① [明] 沈启：《吴江水考》，卷二。

② [明] 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一五《林智勘报苏州府属水利呈》，《四库全书》第578册，第513页。

③ [明] 薛尚质：《常熟水论》。

④ [明] 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二〇《史鉴吴江水利说》，《四库全书》第578册，第513页。



准，然后定图。林应训设计自然圩的大小为五百亩，一圩定一图。

如田过五百亩以上者，便要从中增筑一界岸，一千亩以上者，便要从中增筑两界岸。每界岸底阔四尺，面阔二尺，高与外圩平。岸之两傍，仍可栽种豆、麦。如极低乡，或近河荡深处，难于取土者，就便分别令民于圩内傍圩之田，起土增筑。岸外再筑圩岸一层，高止一半，如阶级之状。岸上遍插水杨，圩外杂植茭芦，以防风浪冲激。取土之田，计其所损，量派各田出银津贴，俟后陆续畚取河泥填平……照此式样，给示遍谕。委官分投区画，每一圩为一图，明白贴说前件，每一图作二本，一送县备照，一付圩甲谕众。<sup>①</sup>

为了圩岸管理，他考虑到了圩岸的相对位置。提出按自然圩内的田解决夫役，“各乡沟洫圩岸，虽有长短广狭不齐，然不过为一圩之田而设也。故田少则圩必小，田多则圩必大，而环圩之沟洫因之。此水利此圩之田，则当役此圩有田之户矣”。林应训的工作促进了共同体的恢复，因为没有小圩与圩甲，就不会有共同体水利社会。他对自然圩内的出工设计是：“随田起役，各自施工。”不再仅仅根据田是否在河岸边定出役之工，而是根据圩内田亩的大小定工量。“横阔十丈者，筑岸十丈。开河亦然，对河两家，各开其半。沟头岸侧面，非一家所能办者，计亩出夫，众共协力，挨序编号，置簿稽查，仍备载前图之后。兴工之日，塘长亦不必沿门催夫，徒取需求科派之议。先期五日，插标分段，责令圩甲播告各户，某日兴工，听其至期各行照段用力，如式挑筑。”他甚至将乡村地方的修圩之规役固定化，并在此基础上实行层层责任制。“今后开工之日，各塘长、圩甲务要在圩时时催督。开工浚完，未可便行开坝放水，俱听各府县掌印官并水利官，分投亲勘。如一圩不完，责在圩甲，一区不完，责在塘长。轻则惩戒，重则罚治。本院与该道，又不时间出以察之。如一县中有十处不完，责在县官，一府有二十处不完，则官又有不得不任其咎矣。”<sup>②</sup>

从塘长向上的层层责任制，实际上就是官僚体制的运行法则，结果是基层共同体的自组织功能和独立的功能几乎完全丧失殆尽。其正常的功能运行最后也完全依赖于官方行政，江南一些地方的圩长制，一开始还有自然圩与共同体的功能，到最后变成一个收赋税的单位，正说明这种共同体的被破坏。当然，一般的官方行政是里甲制，纳入此系统并与收税合而为一，意味着变成官僚基层组织的扩展，而这种组织往往只顾榨取不提供服务。基层组织官僚化，必然无乡绅与农民的主动参与，维持成本也必然增大，由于官僚组织只在县一级，基层的这种组织也经常崩溃。明中后期，太湖东部普遍存在着一个里甲制的崩溃问题。里甲崩溃之时，水利也往往因之崩溃，因为官

① [明]徐光启著，石声汉校注：《农政全书》卷一四《水利》，林应训《修筑河圩以备旱涝以重农务事文移》，第345—349页。

② [明]徐光启著，石声汉校注：《农政全书》卷一四，林应训《修筑河圩以备旱涝以重农务事文移》，第345—349页。

方破坏了民间自为的共同体组织，在官方撤出后，民间的力量也涣散无力。吕光洵的上疏中有：“本臣尝询问故老，以为二三十年以前，民间足食无事，岁时得因其余力营治圩岸，而田益完美。近年民间空乏勤苦，救死不瞻，不暇修缮。故田圩渐坏而岁多水灾。”<sup>①</sup> 吴韶言：“自正德以来，水利全废，塘长人役，不复知水利为何事。旧塍高六七尺者，或与田平，水无所限，遇潦已不足言。稍遇旱暵，向来塍岸塌土成滩，水不可到，畎亩无资，禾亦就萎。”<sup>②</sup> 表面上看，似乎里甲制的崩溃引起圩岸建设的崩溃，滨岛敦俊认为地主城居引发里甲制崩溃。<sup>③</sup> 其实不然，吴韶等人的言论似乎透露当地常有旱情，旱情中的圩岸建设不象吴韶讲的迫切。太湖东部以吴淞江为排水干道时，低地水位大涨，筑圩的必要性很强。正德以来，黄浦江开始分担了大部分出水以后，丰水环境不再，筑圩的必要性也相对减少，一些地区才形成干旱化现象，抗旱倒成了问题了。塘长们不再熟悉水利任务也是因此而起，只有几十年一次的水灾时，整体水网才会因平时的圩岸建设而出问题，而官方的水利整治几十年难有一次。同时，里甲对水利共同体的取代也对共同体的功能丧失起到了推动作用。滨岛错误地估计了乡绅的作用，才把地主城居引起的变化夸大得那么大。在县以下，乡绅对都、区水利事务往往只有向上的发言权，在水利区内，甚至都逃避劳役。以圩甲为核心的民间自组织力量的崩溃才是水利岁修机制崩溃的直接制度因素。

### 三 耿橘时期的复兴

明末的常熟发生了一次里甲制的崩溃，耿橘临任时，粮、塘长制度以及区、都、图等单位已经不起作用。“筑城外画为乡，乡之中有都，都之中有图，乡又名并图，又名里。都之大者又为扇，以分辖各图，扇又名区，厥制旧矣。”他提到旧志中载有9乡，50都，589图，其中589图已“漫无可考”，有名称的图只有158个。他又发现“田粮书‘科则数’所载为里者，肆百捌拾贰，为半里者陆”。各图册的里数相差不一。具体出了什么问题，“今昔异致，吾诚不得其故矣”。在这里，他重点研究了区别问题，“至于扇与区，二名古志新志俱无之，惟‘田粮科则数’实载乡城捌拾伍扇，与今比簿各册数合，今公私通用之扇，即区也。而呼区者为多，顾不以地方名，而以粮户名，甚不雅驯，本县此举原为水利，非地志也，然水由池中行，地志不明，水胡以定。故斟酌古今通其变，将城乡捌拾伍区，次第排之”<sup>④</sup>。区、都、扇在水利

① [明] 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一四，吕光洵：《吕光洵请治田圩疏》，嘉靖二十四年，《四库全书》第578册，第444页。

② [明] 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二〇，吴韶：《水利修圩说》，《四库全书》第578册，第742页。

③ [日] 滨岛敦俊：《明代江南农村社会の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95—96页。

④ [明] 耿橘：《常熟县水利全书》卷三。

运作中都已不起作用，图、里稍有作用。在马墅河一带，常熟县有几个图与邻县因筑坝阻水形成水利争端，文献中以图为单位陈述水利利益。“四都一图、三图幸有杨尖河深阔，引华荡有源之水，入黄存、邵婆、马墅三河，浇灌两图之地，乃上天不弃我民而赐之生活也。顾一图地稍低，又低于杨尖河，即黄存、邵婆、马墅三河俱横经其中三图之地，既稍高崇，仰息于马墅一河焉。”一图有奸民“借口蓄积北来雨水，将马墅南稍筑一大坝，阻绝华荡杨尖之水，使不通于三图，本县查勘至此，见一图之禾稼盛茂，人民殷富，与三图之枯槁萧条若殊天渊”。冈身区因独特的生态条件而有独特的水利社会特点，那里筑坝蓄水引起的争端，并有“豪右专利”<sup>①</sup>。由于图太多，不利于县府整体统辖，也许是他有意仿照林应训，以区辖图，他选择了区建制。区一级传统粮长制度时期的粮长，也就是公正，也被他重新利用起来。在区的基础上，耿橘“照田起夫”地建立起派役制度，照田起夫的政策体现耿橘对河网区水利利益的理解，他认为干枝体系下的所有田地基本上应该均一化派役。

照田起夫，亦难言矣。说者谓有近水利者，远水利者，不得水利者及田止二十亩以下者，分为四等。除十亩以下者免役外，余以三等为伸缩。盖往年之役如此。今窃以为不然，全邑之田，本有不藉水而成者，但河有枝干之殊，水有大小之异耳。彼干河引江湖之水，而枝河非引干河之水者乎。田近干河者称利矣，田近枝河者非干河之利乎。<sup>②</sup>

士绅由于田地较多，在都、区一级的水利派役中常常作弊，“上户挪而为中户，中户挪而为下户，下户近利挪而为远利，远利挪而为不得利。而田少愚弱之氓反差重役，即有控告，而堂高簾远，下情难达，官即知矣，亦苦于查算之难，将置之而不问”。耿橘的“照田起夫”，抑制了这种现象，乡绅的优免权丧失。“水利不论优免，濬河以备旱涝，便转输也。论田而士夫之田多于小民，河成而灌运之利亦多于小民。故同心协力，举地方之大利，在士夫尤勤此念。若论士夫而优免之，则小民独受其苦，大室安享其利，恐徒滋怨望而事难成。昨岁开濬福山河，以此意白之乡绅，乡绅咸各乐从，兴工之日，倡率鼓午，工反先于百姓，而百姓益蒸蒸子来，争先趋事恐后，赖有成绩。”所以，他提议排斥以土地等级分类的办法，尽力按图册派工。“田多者领夫，田少者凑补。”<sup>③</sup> 以前塘长制度的崩溃，在于兴役全由县级调配劳役，越区派役，水利不成利益反成负担。按图圩派役，役不出区，实际上是一种共同体的重建过程。劳役地方化后，可以将高、低乡不同的水利特色在水利共同体的基础上发挥出来，耿橘言：

高区濬河，低区筑岸，各随民便。语云：“种田先治岸，种地先治沟”，不

① [明] 耿橘 《常熟县水利全书》《附录》卷下《马墅河马野庵偶书》、《邑人陈国华拜手跋》。

② [明] 耿橘 《常熟县水利全书》卷一《照田起夫量工给食水利不论优免》。

③ [明] 耿橘 《常熟县水利全书》卷一《照田起夫量工给食水利不论优免》。

易之道也。夫享河之利自宜筑岸，情至顺也。本县正西、西北、正北、东北尽高地，而正东南、正南、西南尽低田。高低既异，风土人情亦殊，驱低区之民而为高乡濬河，驱高乡之民而为低田筑岸，是舟耕牛航也，必不可矣。况各方相去动辄愈百里，今裹粮而越宿而趋他人不急之役，其谁堪之？<sup>①</sup>

基层社区已经很长时间不修圩岸，而岁修制度要依赖共同体。恢复地方化力役制度后，共同体的特色增加，自组织能力加强，岁修制度也因此恢复。耿橘在谈到八十区的圩岸建设时说：“低乡之河不患其不通，患圩岸不能久而无坏也，补筑之法，宜岁一督之。”<sup>②</sup>更重要的是，役不出区和论田起夫的制度恢复了共同体本身的平等，使内聚力加强。“常熟之岸媵，何其多坏而不修耶？询诸父老，其故有五：小民困于工力难继，则苟且目前而不修；大户之田，与小民之田，错壤而处，一寸之瑕，并累其百丈之瑜，即大户亦徘徊四顾而不修；又有小民而佃大户之田者，佃者原非己业，业者第取其租，则彼此耽误而亦不修；或业户肯出本矣，而佃户者，心虞其岸成而或有他人更佃也，竟虚应故事而不实修；或工费浩大，望助于官，官又以钱粮无处，厚责于民，则公私相吝，因循苟且而不修。无怪乎田圩日坏也。”<sup>③</sup>

耿橘在恢复乡村水利共同体的过程中，重点是重建自然圩与自然圩的法度。“围外依形连搭筑岸，围内一体开河。”依河岸和地势，设计围岸。“各圩疆界，多系犬牙交错，势难逐圩分筑，况又不必于分筑者，惟看地形，四边有河，即随河做岸，连搭成围。大者合数十圩，数千百亩，共筑一围。小者即一圩数十亩，自筑一围亦可。但外筑圈岸，内筑戢岸，务合规式，不得卤莽。其大小围内，除原有河渠水势通利，及虽无河渠，而田形平稳者照旧外，不然者，必须相度地势，割田若干亩而开河渠。”在潭塘、任阳、唐市、五瞿、湖南、毕泽诸极低之乡，开圩有一番难度，那里“田浮于水面，四边纯是塘泾。又圩段延袤，大者千顷，小者五六十顷，中间包络水荡数十处，河渠既多，而浜漕又深，无撮土可取也”。耿橘在取土上想了办法，“本县再四思维，此等处，须查本地有老板荒田，其粮已入缓征项下，年久无人告垦者，查明丘段丈尺，出示听民采土筑岸”<sup>④</sup>。重建自然圩以后，也重建了水利标准，他的《水利全书》不单单是一个浚河筑岸的技术手册，也是一个水利规划、水利统治的标准书，是一种针对各区的水利律法，公务人员必须依之行之。“各应修濬区分、田亩已经刊载《水利全书》，一一具备，无烦临期勘扰之难，亦纤悉不容公正、里胥人等挪（那）移，隐射作弊。”正是这些标准，使水利共同体可以在基层社会中正常地运行。业主出食，佃户出工，公正等人也有很具体派定检察标准。“将该图圩得利田

① [明]耿橘：《常熟县水利全书》卷一《高区濬河低区筑岸各随民便》。

② [明]耿橘：《常熟县水利全书》卷一〇。

③ [明]耿橘：《常熟县水利全书》卷一《筑岸法》。

④ [明]耿橘：《常熟县水利全书》卷一《筑岸法》。

亩，验法派定。业户某人，田若干，该濬筑若干丈，应佃户某人出力，应派给米若干”，都一一详细而公开执行。<sup>①</sup>

自然圩的共同体特征是戽水，耿橘对此的关注体现在《常熟水利全书》对每个圩排水问题的重视上。第六十六区辖七个图（里），有河三十八道，圩三十个。其中第二十九图有低洼需筑岸的“曾家圩、化字号圩、盖字号圩等三圩”。就这三圩的水利问题，耿橘布置具体的任务：“化字号岸一千七百三十丈，盖字号岸九十九丈，均用民力急宜修筑，其曾家圩即据字号也。计田不满二十顷，而腹里所包水面不下十五顷。每遇水涝，业户并力车救，然以二十顷之力，而戽十五顷之水，尽缩夜盈，退寸进尺，何以能济之。必将周围圩岸一千四百一十六丈督民修筑，高厚再于高公濠口建一小闸，遇涝堵截，以便车救，遇涸通船，载土筑岸，三五年后岸日高而田日肥，民渐聚而地愈阔矣。”<sup>②</sup> 化字圩一圩面积 2000 亩，算是大圩，一千七百三十丈，盖字号九十九丈，估计只有百亩左右。由于各区的生态条件不同，耿橘的指导很难说是一种强权政治，事实上是一种完善共同体规范的指导。在第九区，开河可以扩大灌溉面积。“本县耿知县查看得本区系西北高处。村镇联络，民居稠密，可称殷阜之地。盖由護塘、白马浜、谢庄塘等河深阔，疏通可资灌溉贰万余亩。故壹、貳图之民无亢旱之忧。至若蔡塘、横塘枝河，久困沙淤，而肆图之高田万亩坐嵌腹内，非大水之年，往往枯槁，而莫之能救。司民牧者，宁忍坐视，设法开濬，不敢不汲汲也。”他直接在此区指点哪里该开河，哪里该筑圩，甚至指挥到小圩。牛尾圩位于城周，“查得看宾汤门外牛尾圩，势甚低洼，每受水患。丈见周围圩岸叁百玖拾丈，督民修筑”<sup>③</sup>。政府在区的基础上统一指导管理，对河道、闸坝、圩岸统一安排，这也体现了区一级的水利共同体社会应该完成的责任。

耿橘所启动的公务人员，却有官僚专制的特色。他用的是“公正”这一地方事务群体，公正长期以来是一般差役人员。在水利工程中，公正有时充当千长。千长的千是与河道长度有关，江南俗称管一百丈河道的工头为百长，管一千丈河道的工头就是千长。“千百长非身家才干兼全者不能服众，三十三年照将尖册，点用十得八九，乃法立弊生。三十四年区书将大户田花分，显小户于册首，点者半系小户，除将该书枷号外，其千长多用该区公正。不足则令公正举报。”<sup>④</sup> 由此可见，区内的水利督催人有固定化的趋势。除公正外，其它可能涉及公务的人员，也参与到区水利的事务中。滨岛认为耿橘的作法是改革<sup>⑤</sup>，其实他只是在试图恢复以前的水利制度而已。以

① [明] 耿橘：《常熟县水利全书》《附录》卷下《谕民修濬河圩告示》。

② [明] 耿橘：《常熟县水利全书》卷九。

③ [明] 耿橘：《常熟县水利全书》卷三。

④ [明] 耿橘：《附用千百长法》。

⑤ [日] 濱島敦俊：《明代江南農村社会の研究》，第 426—429 页。

区为基本单位是明代长期以来的传统,林应训等人也都推广过类似的岸式标准。耿橘的《水利全书》的岸式标准,使基层共同体的管理具有数字化与标准化特征。

各区应濬泾河,必要开报身长若干,面阔若干,应开深若干,两旁得利田若干。他也试图这样建立永久的水利社会,在告示中他称:“本县念汝,为汝等安佚富足永计,昼夜孳孳,尤恐耳目未周。据各区公正造报应濬河道,应建坝闸,应筑围岸等图圩文册,集成《水利全书》。业有端绪,展卷而阅,洞如指掌,由今传后,不惟当事者便于省览,而若辈之子孙皆可以坐照地方之休戚矣。”<sup>①</sup>

但耿橘的作法仍是个人的与官僚集权的,他的水利制度目标是为了赋税,他为了水利制度的推广,对各区公正(粮长)进行过统一的整顿,并将农村中各种游闲人员驱之归农。白茆一带商业发达,他甚至下令禁止商品经济。“本县滨江海,兼以白茆、浒浦、福山、三丈诸港,与通泰、海门各盐场径对。风帆一过,俄顷可达。且于彼,每盐一斤,价不过一厘几毫,于此则五六厘矣。且于彼,衣布米豆之属,成可相贸;于此,则银钱始售矣,无耕耨获刈之劳,而立享数倍之利,此贩盐者之所以纷纷也。卑县除一面责令巡盐主簿,巡检司巡检,以至本县练兵,福山把总等官,各严缉拿外,除拒捕者斩绞,列械者遣配,毫无姑息外,其小船无械与无船有盐等小贩,合无杖之,以惩其过,发之开荒,以遂其生,仍令该区公正收管。季终赴县,递《改行从善结状》,仍随乡约会听讲。夫大贩必除,小贩归耕,日渐月化,草亦有垦矣。”<sup>②</sup>总之,耿橘的改革似乎反映了江南水网区的共同体水利复兴需要强权人物,在当时的环境下,共同体加强难依靠民众自身的力量完成。耿橘这种人物必须具备两方面的能力,一是不顾官僚的利益复兴地方水利共同体,二是他要强化从县到基层水利管理能力。传统的体制赋予他后一种职能,只是前一种功能在全国并不是处处皆有的。这种既“民主”又“集中”的能力,几乎是中国现代社会对管理者要求的翻版,操作难度可想而知。

当地士绅看到了这一点,他们给耿橘立了许多功德碑,几乎把他描述成勤政的伟人。诸如:“精习水利,其于邑中诸港,操小舟遍度形势”<sup>③</sup>;“公戴星出入,朝西北而暮东南,陆行而乘马,水行而载舟,泥行而蹈橇。视慰劳其勤事者,而问扶其不勉者。虽然有长吏之属分督其间,而躬为总揽者,则公也”<sup>④</sup>。儒家文化往往对做过大事的官员过分地歌功颂德。钱时俊在《重浚奚浦记》上这样讲耿橘以前的光景:“民穷皆坐赋重,赋逋坐土瘠,土瘠坐水利壅。”耿橘来到后,“甫下车,廉民间疾苦,谓治田必先治水。循行阡陌,尽历邑中要害之区”。水利成功后,田间景观发生了改

① [明]耿橘:《常熟县水利全书》《附录》卷下《谕民濬筑告示》。

② [明]耿橘:《常熟县水利全书》卷一《开荒申》。

③ [明]顾镇:《白茆港疏治事宜》。民国《重修常昭合志》卷五《水利志附录》。

④ [明]耿橘:《常熟县水利全书》《附录》卷下,管一德《横沥湖漕等河碑》。

变，归绍庆在《浚衡浦记》中记叙：“田间父老，睹河之支分脉贯，靡不欣欣满颊，以为耿公田云。”<sup>①</sup> 国家也想广泛地推广耿橘之法。徐昌祚的《里睦塘碑记》中有这样记载：“公又不恃其才，集通邑父老画地里水道图凡十册，靡应不周。图而上之监司，监司曰：‘善’。颁行江南诸郡，邑长以下悉以公为榷的，江南诸吏无不奔走效公行事。”<sup>②</sup> 以明末的江南水利状况而言，他的经验几乎不能推广。清初，常熟水利又一落千丈。“雍正初年，知县劳公必达浚李墓塘、洋塘。时洋塘望贤桥西有朱斌建议：向来开河例皆落甲发帑，则人夫可以应募，落甲无害；若民间自开，则落甲深为不便。盖甲内之田与人户，大半非土著，以他乡之人开此地之河，而本图之人反逍遥事外，人情不甘，故官即倡而下不应。今当坐图开浚，令圩长作坝，坊长唤夫，业主给食，佃户出力，则土人休戚相关，自然踊跃从事。从之，浹旬告竣。”<sup>③</sup> 落实到基层的赋税都难行实行，说明耿橘的体制由于是靠个人努力成功于一时的，这种共同体自组织自维护的功能很快又崩溃了。

#### 四 小结

长期困扰学术界的共同体地缘问题实际可以从资料上得到明晰的图象。在以上水利区划的讨论中，水环境与三种水利单位息息相关，一是河流的区域，这种区域存在官方与乡村社会的分责；二是水利出工的单位；三是自然圩。自然圩是水利社会共同体的基本，自然圩结构与水网的复合形成江南水网的基本结构，这种基本结构决定了江南水网区的生态——社会复合必然是以圩甲为基本单位向上寻求行政单位，也正是这种复合，共同体社会极易受到官僚体制的伤害。水利社会的地方自主性越来越少，国家统制性越来越强。在常熟，三种单位在明末都已式微，由于耿橘的努力，才出现了局部的复兴，但是很快又复于衰落。由于水利共同体的衰退，江南社会的民众活力在明清时期出现下降，宋元时期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舞台主角的江浙知识分子群体尽管在明末稍兴，在随后的有清一代，始终未能发挥以前那样的作用，这很可能与明中叶以后民间水利社会的式微有关。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宋代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环境变迁史研究”，批准号 098ZZD068；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创新基地项目，批准号 05FCZD023，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王建革，1964 年生，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收稿日期：2009 年 8 月 7 日

① 民国《重修常昭合志》卷五《水利志》。

② 《里睦小志》集文，徐昌祚《里睦塘碑记》。

③ 《里睦小志》水利志。